

师训专场

最专业的听课就是观察学情

——记2017年义乌市小学课堂教学改革现场会



义乌市教育研修院 龚琴娟
义乌市江湾小学 吴高旭

4月底的一天，一个二维码在义乌市教育系统悄然流传开来。只要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能收看课堂直播。当天，有1737人次扫码看直播，留下117条点评和40个赞。这是由义乌市苏溪第四小学承办的全市小学课堂教学改革现场会上的一幕。

现场会展现了义乌市课堂教学改革与时俱进的常态和动态，紧密结合信息化建设，聚焦课堂，火花连连，金句叠出，直指要害——

“学会了”“会学了”远比“学过了”重要。为什么学生互相叫“同学”而不是“同听”？

不要让个别学生成为课堂上的麦霸。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课堂不应该套用丛林法则。

堂，学生们巧用iPad进行组内合作，观察、模拟、绘制北斗七星的模型，展望美丽曼妙的星空。

课堂上，学生们组成的合作学习小组俨然一个科研团队，大家共同发现，共同努力，让科学素养、人文情怀扎实落地。教师则在观察、倾听中适时变换角色，以引领者、导学者、观察者、合作者等多种身份与姿态不断调整课堂教学，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学会学、乐于学保驾护航。

与会教师发现了几位神秘人物——每堂课都有两位教师离开听课席，走近学生，零距离观察。他们是义乌市小学语文“小组合作学习”教研团队的学情观察员。“观察员制的听课课看似新鲜，但在我们小学语文的教研活动中早已是常态，我们追求从‘观教’向‘察学’转变。这是一种专业的态度，更是一种科学的精神。”义乌市教育研修院小学部负责人金妹娟介绍，“平时的小学语文教研活动，每一个参与者都会充当这样的观察员。大家都习惯了，也爱上了。”

这次现场会，金妹娟精选了6位团队骨干担任观察员，更好地为课堂把脉，也借此平台向全市的学校、所有的学科推广这种新型、科学、实用的观课方式。

“我在本节课上重点观察了一个叫小李的男生。因为他所在的小组成绩排名靠后，因此这个小组的学习过程、合作文化更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出小组合作学习的整体水平与成效……在合作制的课堂里，组际间的均衡必须得到关注，特别要为较弱的或容易处于边缘的小组创造机会，可以从评价的角度来体现和保障，可以从分工的内容上来处理，也可以在展示汇报观点时以一帮多。”

“观察时，我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小

组关系、合作状态以及倾听表达情况……小组的4个成员都显得很兴奋，言语交谈也非常轻松。我将眼睛瞄到了两句话，‘你尝尝这个，可能会比较甜’‘你看，这里有一串樱桃，他们是樱桃三兄弟，连在一起的，就像我们小组一样，很团结’。从这样不经意的语言、动作中，可以推断出学生之间互赖、融洽的日常关系……除了合作技能的训练，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课堂文化——安静、理解、包容。”

“《论语》里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圣人无常师’，教要依学而行……如果说提升，首先是怎样进一步在互动的质量上跟进，怎样努力提升每一位成员思维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在话语权的分配上，怎样把握与创造机会；再是教师的评价、追问、反馈、矫正、拓展，怎样保证及时、有效。”

“这次观察最让我感动的是学生组内互动交流表现出的合作文化中的自然和温暖……倾听做得尤为不错。但是全班互动时的语言稍显生硬，只有类似‘我有意见’‘我要补充’‘谢谢，我会改正的’这样的语言。其实学生们真实的互动语言比这样的‘语言扶手’更自然、更幽默、更轻松。这些语言范式在我们合作技能的训练初期需要用，但是当学生渐入佳境时，范式化的互动语言应该慢慢地淡出课堂，而让学生以最真实、最自然的状态投入到学习中去。”

6位观察员各有分

工，各有重点地从学生的举手次数、发言次数、倾听与回应的习惯、交流用语和神态、组内交流方式与效果等多维度进行观察记录、剖析点评，不仅关注知识、技能的掌握，更关注兴趣的激发、思维的发展、品格的塑造，使场上、场下的教师都对教学设计的科学性、实效性，课堂教学的操作性、生成性，尤其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增量、学习状态和情绪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上接第4版)

为什么贺龙比叶挺的排名更靠前？

在黎冰鸿创作的著名油画《南昌起义》中，有一人站在与周恩来几乎同等重要的中心位置，那就是贺龙。当时的贺龙不是共产党员，贺龙之前有一张照片：一身饰有金带和流苏的大帅服，还留着两撇八字胡，活脱脱一副军阀模样。有人黑他是土匪出身，如张国焘，认为张发奎可以争取，而贺龙不可信任。

但是贺龙手下兵力更雄厚。

叶挺和周士第都是师长，贺龙却是军长，他的第二十军下辖3个师，兵力2万，当仁不让地成为起义的主力军。

如果将贺龙争取到我方阵营，起义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立下这个大功劳的是叶剑英。

赤日炎炎，汪精卫约了张发奎和朱培德到庐山，开了一个避暑会议，同时下“十二面金牌”催促叶、贺将所部调往德安，自己上庐山来开会。

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下山了，他邀请贺龙、叶挺在九江甘棠湖乘船纳凉，实际上也相当于开了一个会。

听到叶剑英带来的消息，贺龙恍然大悟，原来张发奎这厮想夺他们的兵权，上庐山一定是凶多吉少。于是贺龙毅然加入了我方战团，后被周恩来直接任命为起义总指挥。从7月25日开始，叶、贺两人一车皮一车皮，源源不断地从九江向南昌运兵。

为什么选择在南昌发动起义？

第二方面军驻地九江——本来就拥有一座城池，直接通电全国就可以了，何必必要移师100多公里外的南昌举行暴动？

因为九江位于长江航道上，三面环水，位置太过暴露，容易被东西两边的敌人夹击。所以，当时的想法是：两点一线，切断宁汉，固守待变。

南昌城的兵力对比迅速发生了逆转，滇军6个团不满员约1万人，我军15个团约3万人。我众敌寡，志在必胜。

南昌城里城外陆续进驻了左派部队，就像比赛中的“人盯人”战术一样，把滇军部队一股一股监视起来。叶挺的指挥部设在百花洲畔的心远大学（女子职业学校），贺龙把第二十军指挥部设在中华圣公会（新教堂），和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指挥部所在的藩台衙门仅仅一墙之隔——诚心让滇军兄弟们晚上睡不好觉嘛！

贺龙还租下了中华圣公会周围的春元、月宫、今兴等几家旅社，江西大旅社就在叶挺和贺龙的指挥部中间。

城市地标“龙门客栈”豪华亮相

电影中的龙门客栈，孤悬在大漠戈壁之中，酒旗高挑，相当惹眼，来往的客商一定会到这里来投宿。客栈中间的天井是饭堂，围绕饭堂的二楼是客房，虽然设施和服务都粗陋得很，还时不时让客商们陷入凶险的境地，但在那寸草不生的黄沙中，也算是“五

星级酒店”了。

位于南昌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是南昌叙事的主要场景，是一幢4层楼高的洋房，一共有96个房间，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天井，和电影中的“龙门客栈”颇为神似。

1924年，3位南昌最有钱的商人集资40万元，建成了这座江西全省最豪华的酒店，与古代的滕王阁一样，是南昌城首屈一指的地标性建筑物。

今天那一带周围也没有多少特别高的建筑。90年前的南昌城，放眼望去，更是一片低矮的民房，江西大旅社巍然耸立，真可谓是鹤立鸡群了。旅社配有单独的发电机，晚上就算全城停电，这里也是灯红酒绿，莺歌燕舞。

“龙门客栈”成了共和国将星的摇篮

7月27日这一天，江西大旅社走进一批军人，领头一个留八字须的圆脸大汉，说是要包下整座大旅社。江西大旅社三等客房就要3块银圆，一等客房要花6块银圆，外加给服务员的小费1块银圆。96间房全包下来，一天得四五百块银圆啊！“龙门客栈”开业都3年了，账房先生还没做过这样的一笔生意。

这位长官就是贺龙，他马上叫人在旅社门口挂上了第二十军第1师部队的牌子，前门后门都架起了俄式机枪，闲杂人等不许进，“龙门客栈”秒变成了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总部。

没多久，一批客商模样的人进场了，他们前几天租住在南昌城的其他地方，在系马桩的一所小学里开过会。现在他们不再需要躲躲藏藏了，这里不仅有一流的客房服务，更重要的是可以放心畅快地商议大事。

他们是中共中央派来的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林伯渠，国民党左派谭平山（“民革”创始人），未就职的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等人。

第二方面军将领云集，将领们每天在一楼喜庆厅召开军事会议。其中鼎鼎大名的有：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郭沫若、第九军党代表章伯钧（农工民主党创始人）、第十一军党代表聂荣臻、第十一军第10师师长蔡廷锴、第十一军第24师党代表阳翰笙（解放后曾任中国文联秘书长）、第二十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

还有一些低级军官参加了起义，如第四军25师73团3营7连连长林彪、第十一军24师71团2营6连连长陶铸（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第二十军3师6团1营营长陈唐、警卫班长粟裕（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20多年后，有的在解放战争中成为战神一般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就有5人：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聂荣臻起义前去25师传令，林彪随25师驻马回岭，严格意义上没有参加8月1日的战斗）。

滇军的朱德为什么会被信任？

7月28日，中共中央任命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入住江西大旅社的一等客房——

二楼转角处的25号房间。周恩来于前一天乔装改扮（在电影《南昌起义》中化装成江湖郎中），住在花园角4号朱德的家中，周围驻扎的是滇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

朱培德和朱德，两人名字差了一个字，这两人是参加蔡锷的讨袁护国战争中闻名全国的“模范二朱”。

这真是要为周恩来捏一把汗，起义军要控制的就是滇军部队。虽然现在谁都知道，日后在井冈山时期，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位于十大元帅之首。但当时朱培德已经倒向蒋介石，又上庐山与武汉的右派会晤，南昌城的军务就交给了朱德。

朱德实际掌握的军队并不多，只有3个连300余人，但拿下周恩来可以说是白费吹灰之力的。“四一二政变”时，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的周恩来，就被上海叛军二十六军第2师师长斯烈扣押。难道这次他又重蹈覆辙？

原来，周恩来和朱德都是当时的海归人士。朱德曾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主修社会科学，想从西方强盛的原因中寻求救国之道。1924年，周恩来在柏林与朱德结识，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中，朱德使出调虎离山之计，宴请了滇军23团、24团的团长，致使这两个团群龙无首，只得向起义军缴械投降。

起义时间是约定的，还是随机的？

在电影《南昌起义》中，有一个几位将领纷纷掏出怀表，读秒同时发动总攻的镜头，在一代观众的记忆里留下很深的印象。诚然，这个镜头很帅很酷，但和真实情况不一样。

警卫班长粟裕回忆，那几天“龙门客栈”忙碌非凡，经常有人上下楼梯，震得地板咚咚直响，前委的同志每天开会到深夜。7月31日下午，每一个士兵都接到了“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

叶、贺两人把营以上干部召集到总部，做最后的战前动员。下午5时，前敌委员会宣布晚上9时全城戒严，并下发了当晚的口令“河山统一”，行动信号为三声枪响，识别标志为：颈系红领带，臂扎白毛巾，在手电筒上贴上用红布剪成的红十字。

当时没有什么噪音污染，三声枪响，足以震彻夜空。所以，根本不需要掏出怀表对比时间。

此外，起义的时间也是一变再变。

前敌委员会原本决定在7月30日起义。张国焘奉共产国际之命前来阻止起义，连续两天在会上引起激烈的争吵。周恩来称这是自己平生唯一的一次和人拍桌子，当即愤而辞职，准备回汉口；眼镜书生恽代英也爆发了怒火，4名委员一致反对共产国际。

起义行动时间改为8月1日凌晨4时，南昌夏季素有“火炉”之称，此时全城人都应该在睡梦中。然而百密一疏，第二十军1师1团3营副营长、云南人赵福生，开会后退进了藩台衙门，也就是同乡滇军的总部。

那时没有监控摄像头，但夜投敌营的事被贺龙部队察觉——“人盯人”战术收到功效。前委立即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也就是8月1日凌晨2时。

然而情况又有了新变化。

省政府卫队的一个连，得知共产党今夜要暴动，不想螳臂当车，也不想束手就擒，更没有弃暗投明的想法。凌晨零时，他们准备把队伍偷偷拉出城，逃之夭夭，刚出省政府后门，就被第1师的哨兵发现了。一问口令，答不上来，妄图退回省政府固守。

哨兵向天鸣枪示警，正好一共开了三枪——这是真正的第一枪，不是象征意义上的。

全城部队听到枪声来自总指挥部方位，一致认定这就是起义的总攻信号，各部向预定的目标发起攻击，贡院、顺化门、天主堂、新营房各处都干上了，于是南昌城噼里啪啦“像过年放鞭炮一般”，比最后确定的时间又提前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的战斗激烈到何种程度？

在“龙门客栈”系列武侠电影中，扶孤义士与阎党高手从屋里杀到屋外，最后在茫茫大漠上对决，是全员高潮、最出彩的部分。

但是南昌起义的战斗远没有这样激烈，一是因为当时使用的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对右派部队进行缴械和改编，就像前面提到的桂系对湘系所做的那样；二是起义部队准备充分，自始至终控制局势，情报的掌握和时间的拿捏非常精准；三是滇军首领朱培德有意无意地放水，从另一个角度为起义立下了大功。

由于叛徒赵福生通风报信，藩台衙门的敌军事先有了准备，用一挺机枪封锁街巷，第1师阵亡20多人，使这里的形势稍显紧张。经过贺龙和刘伯承上阵指挥，将衙门攻下，抓住赵福生就地枪决。

上午6时前，南昌全城被起义军占领，歼灭敌军3000余人。

为什么胜利了还要离开南昌？

两天之后的8月3日，起义军离开南昌，向南进发。起义胜利后缴获银圆50箱，每箱5000枚，以及大批武器弹药。起义军开拔前，每人带250发子弹，有的人自动带上了300发，多余的必须丢掉，大家心疼地看着成捆的枪支被扔进赣江。

南昌起义“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的目的是达到了，但由于朱培德事前调出主力，起义部队“解决三、六、九军”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兵力总数没有实质性的增长，不具备与反动势力在南昌割据对峙的条件。

他们觉得，广州是国民革命的基地，群众基础较好，北伐由于新军阀的叛变而失败了，南征广东，打回老家，就可以组织二次北伐，重启一年前的大革命。于是，他们没有选择困守四面受敌的南昌城。

虽然到了年底，广州起义失败了，但劳苦的工农大众终于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江西大旅社被称为“军旗升起的地方”，起义的日子8月1日被定为建军节，“八一”二字镶嵌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上。